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阐释及其思考

——以两部研究著作为中心的探讨

汪 兵

(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 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史学危机”现象和学术发展需要的双重背景下应运复兴。随后,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通过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中心的探讨,进一步展现以张静如为代表的党史研究者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思想与观点,为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借鉴,也深刻体现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 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社会史;研究方法;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5-0061-05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得到长足进展,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视角的转换。具体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而言,也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内容拓展的产物。但由于中国当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被逐步确立为历史新学科分支,因而,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同时成为中共党史学科和中国当代史学科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和领域。当然,由于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特点、对象和内容等存在些许差异,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这两门学科研究中必然展现出很多的不同。但对于深化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诸如在其通史研究方面,就有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朱汉国主编的《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等出版,还有诸多的专题史研究成果和研究论文不断涌现,但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史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探讨还是比较少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党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张静如先生最先提出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重要观点并深入实践,不仅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开设课程,还指导其博士生以中国现代史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基于此,本文就以张静如指导的两部当代社会史著作(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为中心,对其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作简要评析。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缘起概介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范围内的社会史研究复兴,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奠定以及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和政策条件日益的宽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也逐步确立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路径。因而,概括来说,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内在缘由,应该是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一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历史学界出现了所谓“史学危机”的现象;二是具体就党史研究而言,研究者在回顾整个党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成果时,觉得有必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繁荣和复

[收稿日期] 2017-05-28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2017年高校优秀青年人才计划项目“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gxyq2017149)。

[作者简介] 汪兵(1980—),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

兴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一)“史学危机”现象的出现

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史学危机”的现象,是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出现的一次史学研究反思。就当时危机的过程及其特点来看,旧有的史学研究的理念、方法、模式等与当时变动中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明显的落差,那么,史学界在研究中就会感到有一种迷失和失落的感觉。这是因为,现实的社会变动必然在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中通过理论层面得到深刻的回应和反馈。对于当时的“史学危机”现象的症结,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史学内部体制结构的僵化,二是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反映。有研究者就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史学要么就是满足于简单的解释和应用已被伟大发现了的、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和历史现象的历史法则,要么就是根本无法无视历史的法则,而专心致志于历史的一切细节。”“在一个狭小而又封闭的领域,按照某种先在的规范,单一的兜圈子,才是史学危机的症结所在”。^[1]但反观当时的史学界,普遍仍然局限于“文革”前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问题、近代史的分期与线索问题等探讨;另一方面,历史学研究仍然停留于唯物史观传统内容的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无法在史学研究的思想意识上得以真正的体现。

(二)党史研究者认知的理路

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起源于1986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大陆首届社会史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国内史学界第一次正式研讨了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社会史与其它相关学科、马克思主义等内在关系,因而会议的主旨思想就是“开拓史学研究领域,改变史学研究现状”。随后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组社会史研究的文章,诸如冯尔康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陆震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宋德金的《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等。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得以复兴并向纵深推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党史学界中的有识之士对社会史的研究也积极进行了思索和探讨,其中代表性的研究者就是张静如。对此,他后来回忆道:“大概从1984年起,我开始注意研究社会,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2]在1986年,张静如及其助手刘志强在《教学与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社

会和革命》一文,这篇论文成为张静如后来深入思考“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观点的重要基础。1991年,张静如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一文。这篇代表性的论文,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他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思想与理论观点,诸如何谓社会史、社会史研究的作用与方法、如何把社会史与中共党史等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基本理论问题。随后,张静如又发表了《党史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1949年至1956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变革与社会现代化》等文章,进一步落实以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二、两部中国当代社会史专著的简析

在上文,笔者简要地阐释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起源与动因,作为本文立论的基础。因而,这为进行以张静如指导的两部代表性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专著为中心的探讨提供了理论背景。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日益转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为了深化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拓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日益受到史界重视。具体就党史学界来说,张静如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设置了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方向,培养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专门人才,他所指导的博士论文大都经过修改后得以正式出版。诸如,在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方面,主要有王跃著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福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方增泉著的《近代中国大学(1898—1937)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而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方面,主要有李立志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师吉金著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于风政著的《改造——1949—195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因此,为了给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借鉴,下面就拟以李立志著的《变迁与重建》和师吉金著的《构建与嬗变》两部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作为中心作一简要的考察和评析。

(一)关于李立志《变迁与重建》的概评

首先,作者指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史理论观点的

理解和认知。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主体,因而社会史研究也应该有层次区分;但社会形态史和社会生活史则是社会史研究层次中的最基本的区分。只有社会形态的研究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放在一起,才构成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3]

就李立志的这部著述而言,作者选择的是1949到1956年间的研究时限,也是195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剧烈变动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变动上而言,先后有两次历史飞跃性的深刻变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另外,这个阶段中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诸如,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实现了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转折,因此,它是当代中国进行主动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二是在这个阶段中,也逐步实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模式的转换,即开始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发展模式。在这部书稿的主要内容把握上,作者确立了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为基础的三个研究范畴。所谓社会结构,是在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体系层次之间一种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的模式,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体制、城乡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内容。所谓社会生活,是指组成群体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多种基本运作事项,包括婚姻、衣食住行、语言思维、文娱活动以及民间信仰等内容。所谓社会心理,是一种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向社会思想体系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而作者着重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工商资本家以及知识分子三个重要群体的心理演化。

(二)关于师吉金《构建与嬗变》的概评

作者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也有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还有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那么,就1949年到1957年这个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大陆,建立了国营经济,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等等。这促使社会的生产力初步得到解放、恢复和发展。^[4]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在大陆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当代中国大陆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体展开来说,在经济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工业、农业、商业、财政、金融、贸易等也有了重大的

发展。在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逐步得以建立,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构,以及建立了当代中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在文化上,改革了学制,党和政府制定了科技政策,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外交上,提出了三大外交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阶级和阶层方面,出现了城乡分层,职工内部所有制与行业分层等新社会分层;从阶级的结构来看,中国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党和政府净化了社会环境,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社会心理方面,农民主要有“求富”和“均平”两种心态;民族资产阶级经过了疑惧、兴奋、较量、服从等阶段,最后在无可奈何中走入社会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思想从全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全国的指导思想,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各种思潮都存在着并且进行着争鸣。总之,这个阶段的社会变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完成的。

另外,对于为什么将研究的时限延伸到1957年,作者指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1953年到1957年;二是1957年的上半年和1956年有密切衔接,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总之,从中可看出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相互影响和内在关系。

(三)关于两部专著简要的对比研究

对于这两部当代社会史著述的整体对比研究情况,张静如曾指出,两人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研究的路数却不尽相同。李立志是从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生活的演变、社会心理的变迁三个方面考察1949—1956年中国社会,而师吉金则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考察1949—1957年中国社会。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不同,从而侧重分析的问题也有差异,但他们共同要说明的问题,都是要论证1949—1956年期间中国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变迁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并反过来考察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又如何影响这些领域的变化。就达到这种目的来说,两书各有千秋,可以相互参照,以补不足。不好说哪种做法更好。^[5]

不过,笔者认为,从这两部著作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所使用的文献和资料等诸方面来看,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方面,主要是两位作者对

于社会史观点的理解及其运用存在着差异性。李立志的著作,主要侧重于社会演变中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的研究。而师吉金的著作,侧重于当时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体现在:其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就是通过自己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化体制,使其一直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同发展;其二,1949 到 1957 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对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看,李立志的著作大致可以视为专史研究性质,而师吉金的著作基本上可以视为通史研究性质,并且师吉金的著作与张静如主张的社会史是通史的观点大致比较吻合。总之,这两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专著,一方面是深刻体现张静如关于社会史研究观点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透视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多视角性,充分说明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复杂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利用新的研究方法,选择新的研究角度,对现有史料进行重新的整理与调动,以拓展研究空间,深化现有研究,从而开辟出历史研究的新天地,就成为许多研究者的选择。在国内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和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济南出版社 2003 年版)”。^[6]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复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包括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一方面积极回应了所谓“史学危机”的现象;另一方面,无疑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展开来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对于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因为,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只是局限于政治史方面的书写,主要关注于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史,研究的内容狭窄,编撰的方法单一,缺少对于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全面关照和透视。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张静如就已经提出要进一步扩展党史研究的领域,引入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推动党史研究,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适应了党史研究的这种趋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界积极贯彻这一主张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就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其成果与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相比,仍然显得薄弱,比如还缺少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探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谐社

会的观点,大力加强民生建设,注重创新社会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社会史研究的重心日益向当代研究转移了,因此,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就凸显重要性和针对性。下面,笔者就结合上文两部著作简评的基础上阐述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性思索。

(一)进一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和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诸如像张静如等研究者把社会史研究的成果积极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中,以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来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不仅进一步扩展了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而且,还进一步以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大大提升了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史研究的科学化与学术化的水平,增强了中共党史研究和当代史研究的历史厚度与理论视野。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张静如还把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观点,纳入到他后来构建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体系”。他明确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于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还需要建立一种中介理论体系,那么,“目前初步定下来中介理论体系的结构是: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作用为基础,以个人社会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精华为辅佐。”^[7]

(二)对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影响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积极遵循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还要关注中国共产党进行执政活动的这种实际情况。1949 年 10 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唯一的执政党,因而,中国当代社会整个的变迁和演化,无疑是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重要的社会基础与条件,并且,执政党的所有活动也都会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和演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说,考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不能不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内在变迁;而考察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也不能不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执行。因此,要全面考察中国当代社会的内在变迁和演化,必须把中国共产党执政活动和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内在的连接起来,才能得到合理和准确的解释与分析。这不仅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也

是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实际需要,值得史学界高度重视。而张静如指导的这两部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专著,都是贯彻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主张的重要成果,通过对当代某个时期社会的变迁,来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效,反过来通过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演化来具体透视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影响。另外,张静如所主张的社会史观点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并不排斥“政治史”的内容。反观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有些成果,实践着“眼睛向下看历史”的目标,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与执政党活动的对接。这在实际上违背了社会史研究所要建立一种“整体史”的初衷,也消解了社会史研究的意义。

(三)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肯定上述两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对此还需要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指出不足之处。展开来说,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梳理和考察张静如的社会史研究思想与观点。这是因为,张静如是较早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者,并且积极深入研究,先后主编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中国现代社会史(上下)》(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中国当代社会史(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等。笔者以为,张静如所主张的社会史是一种通史^[8],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尝试将把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研究和社会生活诸多细节的探究有机地勾连起来,从而具体展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路。而本文选取的这两部著作都是以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为基础,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演化,既善于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提炼,也擅长把控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细节,注重史论与史料两相印证,兼顾到可读性。虽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党史学界一直在努力实践着张静如的主张,但在实际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诸如,其一是对于社会史观点的

理解上还存着差异性,研究对象琐碎和杂乱;其二是找材料难,研究者还没有充分利用地方档案史料等,并且文献用材不太讲究;其三是缺少用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概念术语充斥于研究成果,史学研究的特征逐步弱化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是正在行进的历史,而且也并没有太多可供借鉴的理论范式。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张静如提出的以社会史研究深化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主张,所开创出来的是一种较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探索,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整个中国当代史学的综合性研究。这对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这也进一步发挥了中共党史学科的“资政育人”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总之,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中,不仅需要深刻揭示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并且也要使研究的成果作为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理来源,从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徐梓. 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J]. 江汉论坛,1987(9): 74—77.
- [2] 张静如. 张静如文集:第二卷[M].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429.
- [3] 李立志. 变迁与重建:1949—1956 年的中国社会[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8.
- [4] 师吉金. 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1949—1957)[M].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3:18.
- [5] 张静如. 张静如文集:第四卷[M].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1174—1175.
- [6] 侯松涛. 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审视[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1):6—13.
- [7] 张静如. 暮年忆往[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322.
- [8] 汪兵. 张静如与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研究[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3):78—84.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下转第 84 页)